

辛亥革命意義

陶希聖

一 世界市場的構成與中國社會的原型

「資本階級迅速增進生產手段並大量利便交通方法，以此將世界種種的民族，收入所謂文明的圈套。廉價的商品，是打破中國長城的重礙，強迫那最倔強的落後民族，克服他們對外國人的仇恨。資本階級強制一切民族，接受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強制他們接受所謂文明，改變他們自己為資本階級。簡言之，資本階級以他們自己的模型而創造世界。」

資本主義為完成世界市場計，把中國和日本的市場打開。中國由此乃加入所謂文明的圈套。中國的舊有資產階級由此乃逐漸變化為資本家階級，以追隨世界的資本家。一八九七年，康有為已指出這一點來。他由工部代表的請變法書裏說道：

86875

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

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

（宋玉卿戊壬錄卷上所載）

在康有為這話二十五年以前，李鴻章也曾說同樣的話。李氏在同治十一年即一八七二年，覆議停止製造輪船局的奏摺裏說道：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載，互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而通商……合地球東南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四頁引）

這四千年來的一大變局，全由中國加入世界市場而起。辛亥革命不過是這一大變局中間的一幕。牠也是中國加入世界市場的一個結果現象，固不待言。

中國社會因外國資本主義引進世界市場而生變化。不用說，這變化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所受於外國資本的影響；他方面又表現着中國

社會舊來的特性。辛亥革命這個過程也指示我們以這兩方面。辛亥革命一方面有與中國從來的革命過程相異的性質，他方面卻有與中國從來的革命相同的途徑。由前一方面來看，辛亥革命為中國歷史開一個現代革命的紀錄；由後一方面來看，辛亥革命仍然是從來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戲曲之再演。因此，中國辛亥革命與日本明治維新雖同由於世界市場的加入而起，然而兩者的過程和結果乃大異。

辛亥革命與明治維新過程與結果的差異，是要由兩方面來看的。其第一方面是與外國資本主義接觸的時機不同；其第二方面是兩國在與外國資本主義接觸時社會的構造及其他自然條件有別。先由第一方面來簡略的觀察。原來世界市場在歷史上是由西向東開拓的，印度先於中國，中國先於日本。當英國以重砲打開中國的封鎖的時候（一八四二年），他已無餘力再征日本。然而鴉片戰爭的勝利，使日本知所謂「攘夷」為不可能，遂一變排外政策，發布所謂天保薪水令，對於外國商船，予以招待。此後一連若干年，英國為保持中國的市場，先須向中國政府開砲（如英法聯軍），後又須克服中國暴動的農民軍（太平天國），沒有抓住日本的餘暇。日本開港比中國遲十五年。在十五年初，英國對中國的攻擊是沒有受別國牽制的。十五年過後，俄法美德與英國已在亞洲保持均衡，所以他們對日本的行動，沒有像對中國那樣放肆。而日本慌於中國戰敗的教訓，也自動開港對待他們了。同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歐洲革命的風雲，及一八六一年南北美戰爭，把

列強都牽進漩渦，減少他們對待日本的力量。這是日本開港與中國開港所不同的處所。因此，中國開港以後，便走上殖民地的路；而日本開港以後，卻有民族資本主義的發達。（服部之總明治維新史第一章說明這幾點，很為明晰，可以參看。）

再從第二方面看，中國所以一經外國資本侵入，便走上殖民地的路，而解放運動陷入屢起屢仆的境遇，這確於中國社會構造有甚深的內在的原因。本文注重這種內在的原因，以說明四千年來一大變局裏面辛亥革命的一幕。

（甲）中國舊來的社會構造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與劉坤一變法第三疏有幾句話把外國資本的要點，指將出來：

世人多謂西國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國之富實以工。蓋商者運已成之貨，工者造未成之貨——粗者使精，賤者使貴，朽廢者使有用。有工藝然後有貨物，有貨物然後商賈有販運。（變法三疏大字鉛印單行本）

這幾句話指出資本主義的重要現象。現象的裏面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是為市場而生產商品的。商品生產出來，是要向市場移運的。販賣商品到市場去的商業，是受商品移向市場的運動所指揮。有大量要向市場移動的商品，而後有販賣牠們的商業。

中國何嘗沒有高度發達的商業？卻與歐洲資本主義的商業不同。他

們的商業，是受商品的運動所指揮；中國的商業，乃是收集多數小生產者（手工業，農民）的生產物而販賣於市場的。小生產者的生產物，直到了商人的手裏，纔變為商品。商品不能指揮商人，反之，商人化生產物為商品。工業不能支配商業，反之，商業支配工業。

中國舊來的商業經濟是以手工業及小農民生產為基礎的。手工業及小農民生產，不是完全為市場而生產的，——不是完全的商品生產。獨立的手工業在中國久已存在，但牠們是受商人支配的。商人委託手工業者製造市場所需要的商品。商人供給原料於手工業者而收取其製品。手工業者沒有實力直接與市場接觸，不能夠自己變做商人。至於農民，則除了絲茶棉麻等商品生產而外，大部分是為自己和地主的消費而生產，他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之下，纔出賣他們的生產物。商人便以操縱物價及壟斷市場的手段，使他們日處於迫不得已的情勢之下。在他們收穫以後，商人予以肥料農具及日用品，而廉價購取農產物。在耕植正忙的時候，農家贖下的米麥吃完了，商人便予以米麥而迫他們於借貸的困境，以收取利息。

每個獨立小農民都須與市場接觸。每個獨立小農民都受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操縱。這種「商人兼併農人，農人流亡」的情形，早已存在於中國。

雖有集中多數小生產者的交換行為的商業，但生產還不是發達的商品生產。生產制度，在沒有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前，還是手工業

及小農生產制度。姑置手工業制度於不論。主要的生產乃是農業，而農業經濟早由莊園經濟進入於獨立小農場經濟。小農場的耕種者，無論是自耕農或是佃戶，大抵以自己的計算來經營這小農場。有些地方，地主供給佃農以肥料和種籽，但多數的地方，佃農也是獨立與市場為交易，——販賣農產物於市場以購買肥料和農具等物。

農業雖早由莊園經濟進入於小農場獨立經營的經濟，佃農所受於地主的剝削，仍然是封建式的。不過佃農雖占全體農民人口的顯著的部分，但因小農場經濟之故，自耕農的成分也很巨大。並且，隨小農場經濟發達而發達的商業資本，已與封建剝削制度發生一種有機的關係。商業資本有一部分投入農村，購買耕地來收取農民的地租。商人與地主早已形成「兼業」的形勢。商人可以購買耕地而地主可以經營商業。並且，商業都市發達，而商品交換茂盛。與此接觸的地主，容易陷入奢侈浪費的前途。地主為彌補他浪費奢侈的漏卮，乃加重地租的剝削。其商人而投資購買耕地者，為使地租收入足償所投資本（地價）的利息起見，投資愈多則地租愈益加重。由此可見封建剝削與商業資本已有密切的關聯，而封建剝削乃隨商業經濟之發達而加重。

商業高利貸資本高度發達，以金融資本為其最高的形式。明末清初以降，錢莊、票號、銀舖，各種金融貨幣機關漸次發達。由於上述資本累積而生產不振的情形，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現象早已顯著。嘯亭雜錄記商人地主的豪奢，說道：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素封之家，比戶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遊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懷柔郝氏，膏腴萬頃，純廟常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王公近侍及興臺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

商人地主及官僚之豪侈，於濫用勞力一點，也可以看出來。清代之初，如顧亭林所記：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註）方侍郎曰：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縫紉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奢侈的都市生活又使豪家易於破敗。尤以耕地投資既多，耕地買賣愈益盛行，而地主愈益容易兼併，也愈益容易破產。顧亭林記道：

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同上卷十三）

李文貞也有同樣的浩歎，說道：

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道。興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閱鄉邨舊家，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徵乎？祖德其可恃乎？

（同上注引）

這種豪家易起易落的現象，確是商業經濟發達的象徵。在歷史上，唐代以前還不如如此。那時候，幾百年的世家很多，私有田園，保持到十幾代，是

很不少見的事。五代以後，乃「無百年全盛之家」了。

（乙）清代的政治構造

在如上所說的基礎上面，政治構造是怎樣的呢？清代的政治構造有與前代不同的幾點，現在說明如下：

第一是極端的君主集權。中央政府（內閣後來移歸軍機處）與地方政府（督撫）同隸於君主的下面。內閣或軍機處不能夠牽制各省，中央與各省的行政關係，必須經由君主，纔可互達。各省與各省的關係也要經由君主。中央政府各機關也同隸於君主之下，彼此沒有相統制的關係，一切須經由君主，纔可以互達。無論中央及地方，大權的行使，都集中於君主個人。（詳見李劍農前引書九頁至十六頁）

第二是在君主集權的形體裏面，潛伏着極端的地方分權的根芽。各省的政府以總督或巡撫爲最高首長。他對全省事務有很大的權力，只向皇帝負責，也只受皇帝的限制。一省的區域劃分，本是沿明代舊制，但明代的巡按使在制度上是一種巡迴視察的欽差，而清代的督撫卻成固定的機關。廣大的幅員的省區，乃委於一個握有軍政大權的固定機關，而擔當這個機關的人又只向皇帝一人負責，這是極端的地方分權的根源了。在君主權威隆盛時，督撫是俯首帖耳於皇帝之前的。然而中央的權威一有動搖，自呈尾大不掉之勢。

清代政治組織所以形成這樣的形勢，是有社會的原因的。這社會的原因就是前面說過的商業資本高度發達而生產還是手工業及小農

業生產。從生產上說，落後的手工生產及小農場經營，只能夠使生產者自封於小地方共同體以內。這小地方共同體便是縣與州廳的基礎組織。在一州一縣或一廳以內，生產者及其剝削者差不多可以過一種半自足自給的生活。由這一點來說，中國舊來的政治組織必然趨於小地方共同體的分權主義。但是，各地方共同體的生產組織之間，早已發生分工的關係。各地的交換，已經不能夠間斷的了。農民的鐵器，肥料，食鹽這一類的用品，已經受特殊產地的供給。而獨立的手工業已經適應各地的自然條件而特殊化：多鐵的區域，乃多鐵器，多桑與棉的區域，乃多絲布。至於棉茶等農業商品生產的區域，更不用說須要向外面求銷場。這樣，各地方共同體之間固定的交換，已把多數小地方共同體組織為一個大省區。大商業都市，形成各大省區的政治樞紐。多數大商業都市之間的經濟交通，就是全國政治組織的構成條件。隨商業發達的程度，以定此政治組織集中的程度。如此，由生產上看，其政治組織必以地方分權為特徵；由交換及生產組織的分工來看，其政治組織又必以中央集權為趨勢。

在這樣的生產與交換方法之中，商人階級企圖擴大他們的市場；地主階級企圖擴大他們奪取地稅的場所。這乃是中央集權所以成立的條件。然而商人階級於擴大市場之中，發生爭奪市場的內鬩。地主階級於爭取地稅之時，也發生把持地位的黨系。於是，一方面地方社會組織日益擴大，而地方行政區域也相隨增長。他方面省界的成見，深存於商

人地主之間。簡言之，各地方組織彼此之間，一面需要聯絡，他方潛伏競爭。

於上述各種矛盾之上，滿族於鎮壓李闖張獻忠等大規模農民騷動以後，以少數民族的精強武力，建設了君主極端集權而潛伏着督撫極端分權的根芽的統一國家。中國的商人地主爲了苟免農民騷動的危機，對於這少數民族的貴族政府，不得不甘心忍受。依於這種階級對抗的抑制作用，滿族政府獲取中國商人地主的擁戴，維持他極端集權的形勢，差不多有二百年。（由滿清征服漢族到太平天國時期。）

二 中國所受於外國資本的影響及社會的變化

然而督撫的分權的潛勢，一到滿清政府動搖的時期，便要表現出來。太平天國之革命，就是滿清政府動搖的厄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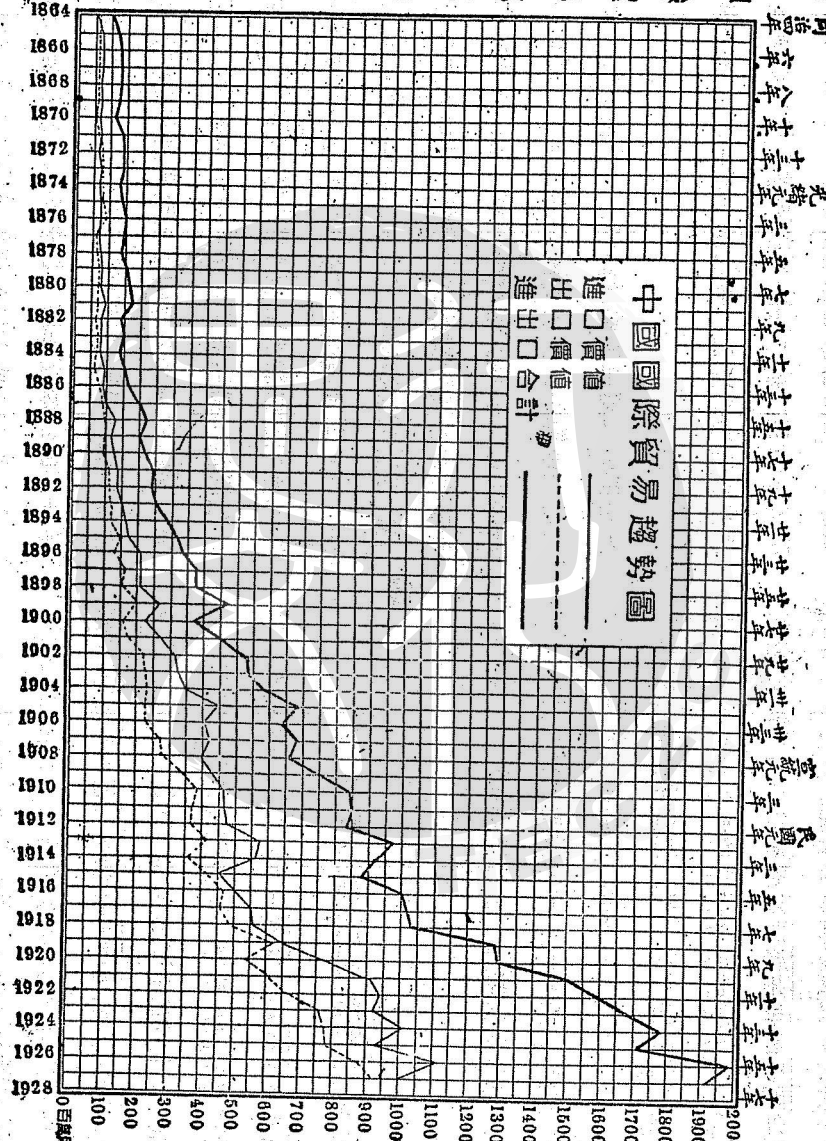
（甲）兩廣蜂起的由來

洪楊的農民無產者軍隊，是起於兩廣的。原來，五口通商的條約，只成立於一八四二年，而洪楊革命即起於一八五〇年。這是受外國資本的影響嗎？是的。在五口通商以前，廣州早是中國外國貿易的最大商港。廣州的周圍，受外國資本的影響最早，單以放款一項來說，遠在乾隆十七年即一七五二年，廣東商人對英人所負債務，約達三百八十萬一千有餘先令之多。（蕭一山前引書四八五頁）這大抵是借給商人轉借於

86880 農民的農民受外國商品及高利貸資本「雙管齊」下的剝削，破產失業相踵而至。洪楊一呼，革命爆發。各省農民無產者，相與響應。這一舉便成了滿清政府崩潰的動力。

若就外國資本在兩廣以外各省的影響來說，我們可以說直到一九〇〇年以後，這影響纔突然擴大，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外國資本還沒有很深的普遍的侵入中國社會的中心，我們試舉出中國外國貿易的趨勢來一看，便可以看出這個消息了。

中國國際貿易的趨勢圖



趨勢圖(見武培幹中國國際貿易概論五頁)

由這個圖可以看出無論是進口或出口，自一九〇〇年以前，數量還

不很大。一到一九〇〇年以後，數量就迅速增加了。

中國的機器工業，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差不多沒有顯著的興起。就進口機器來說，自一八九五年以後，每年不過值銀二百萬兩，到歐洲前後纔突然增加。就歷史事實說，政府對工業及其他資本主義經濟機關如銀行等大規模的規劃和開設，大抵是一九〇〇年左右的

事情。列強對中國生產的投資，也在一八九五年以後。由此可知太平革命，不獨沒有集中的生產做社會主義的基礎，即農民無產者階層，也仍然以中國舊來的商業資本及封建剝削所造成的分子最居多數。太平天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容易成功的。

基礎，即農民無產者階層，也仍然以中國舊來的商業資本及封建剝削所造成的分子最居多數。太平天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容易成功的。

(乙) 太平天國平定後政權歸宿問題

在太平天國時期，內地各省商業資本和封建剝削所造成的破產農民，以大量的無產者爲中堅而蜂起。但這無產者羣集，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產物，而以中國舊社會的產物游民無產者最居多數。太平天國以這種游民無產者的消費共產團體爲主力。消費共產團體在古領東南財富之區以後，牠的上層支配集團腐敗了。中國的商人地主階級乃乘其弊，藉助於外國資本主義的武裝和將領，戰勝太平軍。

在太平軍將領將次腐敗的時期，曾國藩等領導富農及中農，崛起於長江流域，中農富農是爲土地私有制度而戰的。這時候，外國資本還沒有浸透長江流域。中農的貧窮化，還沒有開始。他們希望保持土地私有制度。他們甘心受地主的領導，以與貧農無產者的社會主義戰，地主階級則於土地私有制度之外，更爲恢復地租的關係而致力。他們於此，必須恢復主佃的身分；因此又必須恢復君臣的政治名分，以及族長統治的社會名分。他們乃以保護孔子學說爲倡導。他們是爲自己的土地及地租權而戰的，而無形中遂保全君臣大義所支持的滿清貴族政府。

自此以後，漢族地主階級已於滿清貴族妬視之下，獲得那參加一切樞要的政治地位的權利。滿清的政府完全仗他們保持，滿清貴族的讓步是不得已的。並且，滿族中央政府的權威，已受太平運動的打擊。太平天國失敗以後，各省區政府「尾大不掉」之勢已成。曾李以降的漢族有力者（即平定太平運動有力的將領及其所提攜起來的後繼者）

已漸次統領重要省區如直隸，江蘇，湖北等省的政權。

簡捷的說，在滿族入關的時候，漢族商人地主階級所憂的是農民騷動。滿族的貴族既以他們的武力平定這一大騷動，則漢族商人地主已心悅誠服。等到滿族貴族抑制漢族商人地主的政治地位並違反他們的習慣與情性的時候，他們纔憂在滿族，乃於農民平定後從事於反滿。然而遲了。到了太平天國時代，漢族商人地主同樣的憂在農民。到了太平天國平定後，他們卻不憂滿族。因爲什麼呢？那一次是他們賴滿人貴族的武力平定農民，這回卻是滿族賴他們的武力平定農民了。他們憂不在滿族政府，而在外國資本主義。因之，漢族士大夫在太平天國失敗後，大抵不主張排滿，而最急進的也不過致力於維新。

三 由維新運動到革命運動

漢族商人地主之中，就其間知識分子即士大夫而論，可分三派。第一是保守派。他們滿意於農民騷動的鎮定。他們偷生苟活於滿族政府之下，資本主義怒潮之前。他們不獨反對維新運動，並且反對舉行新政。依薛福成所述，這種勢力不小。他給李鴻章的信說道：

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爲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

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腹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李劍農前引書八頁所引）

第二是新政派，當局的漢族士大夫。這派反對維新運動，卻主張力行新政。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及薛福成等是著名的人物。他們的理論是以中法為體，而運用西法。他們的理論歸納起來不過如下的幾句話：

采西法以補中法之不足……以變而不失其正為主。（張之洞劉坤一變法第三疏）

他們是滿意於農民平定後的秩序，而欲以此圖振興資本主義而與外國資本主義競存的。

第三派是維新派。這派是主張君主立憲的。他們要把太平天國平定後滿洲貴族對漢族商人地主均衡之上的絕對王權，改為漢族商人地主對農民的均衡之上的絕對王權。康有為及梁啟超等是最著名的人物。康有為請變法書的第一策說得很明白：

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明治政法是什麼？就是立憲政體。大彼得心法是什麼？就是絕對王權。他們主張改定立憲政體，以適應於資本主義的發達，而與外國資本主義合流，卻反對動搖絕對王權，予農民無產者以蜂起之隙。

（甲） 保守派的掙扎

在一九〇〇年以前，最大的勢力要算保守的勢力了。在這時候，外國資本侵入中國者，取商品的形式。新式廉價商品是土貨市場的篡奪者。土貨受新式商品的競爭，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土貨商人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外國商品所到的處所，農村副業隨之衰落，農民欲望隨之提高。這是破壞農民納租能力的。同時新都市生活所在的地方，地主的開支增加，乃不得不以大量地租換取貨幣，作購買洋貨之用。這是促進地主的困窮的。所以鄉村地主也反對外國資本主義。

漢族商人地主與滿洲貴族均衡之上的絕對王權，因此對外國的侵略，取反抗政策。他們既反對資本主義，自然反對企圖與資本主義合流的新政及維新運動。他們既反對資本主義，自然只有溯諸原始迷信，以神力反抗資本主義的科學的武器了。他們於一八九八年抑制維新運動以後，便以義和拳打公使館，殺洋鬼子。這是一貫的行為，到了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進駐北京，他們的反科學武器及資本主義的勇氣，纔完全喪失。

（乙） 新政派的結局

中國商人地主政府既屢被列強打敗，他們的執政權者如曾左李及張之洞等，目覩列強所以取勝，在軍事上是有科學的武器，在經濟上是有機器工業。他們於是開機器廠，設兵工廠，開設學堂以養成工業及武備人才。他們注意外交，他們高談洋務。其結果，新軍成立，在北洋，奠定袁世凱系的基礎；在南方則供予辛亥革命以相當的武力。

(丙) 維新派的下野

主張改革政體而保持王室的維新運動者，在一八九八年，乘中日戰爭失敗之後，朝野震驚之餘，以獲取君主的眷顧的方法，曾有一百天的期間，發號施令於中國。但是這樣發布的號令，對於尾大不掉的各省，沒有指揮如意的可能；而在中央，則徒然裁撤冗官，得罪官僚分子。康有爲逃亡了，六君子被殺了。維新的主張者因之流爲在野的黨派。

同樣的政治主張，因主張者在朝、在野之不同，而所持理論及主張的細目，有緩和與急進的差異。即如同樣主張君主立憲，康有爲在一八九八年要向朝廷進取，則其理論以春秋公羊傳爲憑依，其主張的細目富於守舊的色彩。梁啓超在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間，則以歐美民主主義學說爲理論，而主張法治，反對儒家的人治主義，非薄宋儒與清代漢學家，即對孔子學說有所依傍，也不過稍取孟子的話頭。以梁氏爲中心，進步的士大夫及新興知識分子，遂形成一個與革命派對抗的立憲派，其作用在訴諸商人地主階級，使完成資本主義化的過程。

(丁) 立憲派反對革命的理由

立憲派主張以商人地主階級民主政權發達資本主義，這是錯誤的。獨立發達的商業資本，是以舊生產方法爲前提而發達的。商業資本並沒有改進生產方法的意思。所以中國商業資本發達已久，而生產方法沒有顯著的進步。這種資本乃是真正資本主義的障礙，且隨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必歸破壞。然而立憲派對農民無產者的蜂起，懷抱恐怖。他們

反對以農民無產者的勢力，破壞社會舊來的秩序。

在一九〇二年，梁啓超氏對於革命的反對論，非常明晰的指出「下層社會」的革命不可行。他指出歐洲各國革命是中間階級的革命。他以爲中國從來沒有中間階級的革命。他說：

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數千年（中國）歷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廐之一事，此後蓋闕乎未有聞也。（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但他又主張立憲主義應當以中等社會爲骨幹。他說：

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政治革命主義，漸普及於下等社會；……使今日中國之多數人皆知政治革命主義而循吾所謂正當手段以進行也。其現今在政界地位已高者陳利害於君主，其次高者陳利害於上憲及其僚，即其未入仕途者，或其父兄，或其朋友，苟有可以爲陳利害者悉陳之，以浸潤移其迷見，其效即可以極速。（同

上卷三十三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由上可知他所謂「中等社會」仍不過是士大夫階級，仍不過是舊來改朝易代時期的地主，如漢末的劉表，袁紹，隋末的王世充，唐末的諸藩鎮之流，這其實是「上等社會」。然則梁氏一派是主張士大夫的憲政的了。

86884 原來中國自戰國以後，社會構造便以兩大社會層爲支柱，一是商人地主聯合集團，一是農民。官僚看來好像一大階級，卻不外地主階級瓜

分地稅及保障地租的手段。貴族如諸侯王之類看來好像一最上層的身分，卻不外官僚的尖端，衣食租稅的寄生蟲。梁啓超氏所指上等社會是指貴族官僚，而下層社會是指農民及貧農無產者。（他把光武、項羽、李密等列入下等社會卻是錯誤，他們乃是地主階級的士人。）若知貴族官僚不過尖端的地主，則從來中國的政治轉變，只是地主與農民的對抗所形成。除此以外，本沒有相當於法國革命的領導者工業資本階級的勢力，即沒有有力的「中間階級」。

資本家階級既不存在於中國，（雖有而在當時沒有多大的勢力，）故在當時，民主革命不能以所謂「中等社會」爲領導，其事至明。在當時，商人地主階級則反對革命，而能够支持革命的，只有所謂「下等社會」即農民無產者。因爲只有農民無產者能够支持革命，商人地主階級更反對革命了。而且在太平天國以後，漢族商人地主有力的代表人士大夫，已與滿洲貴族在政府裏駢肩聯立。所以梁啓超否認中國亡於滿族，而很露骨的說出如下的一段話。

以今日論之，號稱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鎮其間者漢人耶，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爲其傀儡耶？（指袁世凱爲北洋大臣而言。）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乃至滿洲之本土東三省，今撫而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平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

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衷於事實也。（李劍農前引書一七一頁引）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須去掉滿洲貴族，使絕對王權變成純漢族商人地主對抗農民無產者的權力，在漢族士大夫已經滿意了。所以，一九〇〇年以後，保守派因受了八國聯軍的挫折，而立憲主義乃在野爲維新派所鼓吹，竟聳動一時；在朝則滿洲貴族及保守派官僚也漸漸採取了。

（戊）立憲的宣布與革命運動的開展

一九〇五年以後，滿洲政府遂屢次宣示立憲的詔旨。汪精衛氏指出立憲的內幕道：

所謂以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者，立憲是已。往者虜中持陰柔政策者必主立憲，而持強悍政策者必非立憲。泊乎近日，則強悍者陰柔者皆趨於立憲之鵠而無所歧。若是者何也？則以立憲者非惟陰柔政策之實施，實亦強悍政策之妙用也。……以憲法定君主之大權，專制之淫威，有憲法條文爲之擁護，無所施而不可，凡種種可以束縛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財產，而曩者懼衆怒難犯，有所憚而不敢爲者，至此皆可藉維持安寧秩序增進臣民幸福之理由，而次第勒爲成法。嗚呼！專制之威，其極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止耳！藉立憲以行專制，乃并使人不敢怒也。（汪精衛論革命之趨勢）

滿洲貴族既想以憲法保障君主的大權，並緩和漢族士大夫的進取，於是宣布立憲的詔書，便是喚起漢族士大夫嫉視自己的檄文。立憲的主

張，光燄消沉，而革命的空氣，漸次瀰漫了。

四 革命組織的構成

中國從來的革命，都是以貧農無產者蜂起爲開端的。誠有如陳天華氏所說：

法之革命，主動爲市民，非普及於最大多數。而前乎此所謂平民團體者，其範圍極狹，（希臘之市民，羅馬之公民，其數極少；其極多數爲奴隸。）亦一次等之貴族團體也。謂泰西於中古以前，已有平民革命，不過表面之名詞；實際尚不如中國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尙近之。（陳天華集，上編二頁）

自一八九五年以後，資本主義各國對於中國的侵略方法又改變了。他們於輸入商品之外，更輸入工業組織的本身。他們漸次在中國境內設立工廠，直接改變中國的無產者爲生產的勞動階級，加以剝削。一九〇〇年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已轉變爲金融資本主義。他們對中國除輸入商品及開設工廠以外，並輸入資本。他們所輸入的資本，侵入中國的銀行，參加中國的工業，扶助中國的商業，開展中國的高利貸借。他們所輸入的資本，腐化中國的官僚。由此以後，中國的商人地主官僚，漸漸都帶有外國資本代理人的性質，——漸漸都化爲外國的買辦。政府的外交政策遂由抗外而趨於恃外。商人地主對外的態度遂由排外而變成媚外了。商人地主的代表者的士大夫，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反對立憲，在一

九〇〇年以後也不能贊成革命，至多只主張立憲。然而這時期，於士大夫之外，因新政的舉行，新生一種學校養成的知識分子，或留學外國，或求學國內。他們對於一九〇〇年以來漸次發達的新工業，是努力支持的。新工業家及支持新工業的知識分子，乃是相當於梁啓超所謂「中等社會」的羣集。他們有繼舊商人地主及士大夫而興起的歷史的運命。他們的利害是與商業資本及封建剝削所構成的龐大官僚組織，還沒有一致的。

在如上所述的社會變遷裏面，產生一個革命黨派。這個黨派最初潛滋暗長於反對官僚紳士（士大夫）的江湖羣衆之間。一八九二年的興中會，得與會黨聯絡，始有發展，而其時士大夫反對排滿和革命。一九〇〇年以後，這個黨派纔吸收多數留學生。一九〇五年，包容會黨分子及留學生的同盟會成立於歐洲。「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南京武昌新軍軍官（新知識分子）參加的不少。自興中會以來，華僑已有參加，同盟會時代，華僑參加的更多了。這個貧苦江湖民衆及新知識分子華僑的集團，自一八九五年乙未之役以後，以會黨的力量，領導貧苦農工羣衆，蜂起於廣東湖南各地，屢興屢仆。由商人地主階級看來，這是一個暴亂團體。他們對於這個團體「英雄張獻忠而神聖洪秀全」的批評，指出這個團體以所謂「下層社會」爲主力的可怖。

但是如果竟認定同盟會是農民無產者黨，卻是錯誤的。與同盟會是「中等社會」即中間階級領導農民無產者打破滿洲貴族及

86886

漢族商人地主的政權的黨。試看當日民報主筆陳天華氏對會黨的觀察，可以知道一個大概了。陳氏絕命書說道：

會黨可以備用，不可倚爲本營。日本不能用馬賊交戰，光武不能用

銅馬赤眉平定天下，况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

他主張是怎樣的呢？他說：

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

再看下列的一段話，也可證明與同盟會是民族民權革命的黨，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黨。汪精衛民族的國民一文駁立憲論道：

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爲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對之只有唯一之國民主義，踏厥政體而目的達矣。然今之政府爲異族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由達。

當時，孫中山先生是注意於社會問題的。（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時，到處演講，常致意於社會主義。）然而與中會同盟會仍然是「中等社會」領導下層民衆的革命集團，其工作在顛覆滿清，建立民主政治。

五 革命行程的展開及失敗

下層民衆是行動的階級。中間階級要反抗滿洲貴族及漢族官僚的

統治，必須訴諸民衆，喚起他們的行動。所以自一九〇五年以後至辛亥革命以前，廣東湖南各地的平民蜂起，是辛亥革命的先河。舊政府的權威，在辛亥以前，已經消滅於平民之間。中央權力已呈解紐之勢。滿洲貴族的自信力以及漢族商人地主對滿洲貴族的信任心，已隨各地蜂起之展開而喪失。滿洲貴族的虛偽立憲，也引起漢族士大夫的歧視。

由上所述，辛亥革命是以貧農無產者羣衆的活動爲開端的。然而辛亥革命的自身，則大體由覺醒的中間階級及新知識分子實行。長江一帶的新軍，純然是新知識分子領率的武力。這當然可以說是中間階級的武力了。

中國從來的革命，常發動於農民無產者，而由商人地主收功。這種向對立物而轉變的行程，反覆見於歷史。大抵當農民無產者蜂起之初，商人地主取反抗的態度。他們卻不止單純的反抗，他們常窺伺農民無產者諸指揮集團，擇取一二能轉變而保護私有制度及地租關係者，與之結納。商人地主的知識分子（士大夫）於此時乃羣趨於此一二指揮集團之前，收取革命流產所給予他們的成果。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中間階級新知識分子）在革命發展的時期，充滿民族民權革命的氣勢，而社會主義的呼號只數見於孫中山先生歷次演講之中。與中會同盟會所承繼於太平天國的「平均地權」政策，已爲種族及民主思想所隱蔽。這樣的革命，當然容易被商人地主士大夫所乘。於是，由平民發動起來的革命，不久便充滿妥協的氣概。在軍

事上，則爲新知識分子統率的南方新軍，竟與新政派官僚統率的北洋新軍圖融。在社會上，則有官僚紳士的大量投機。在政治上，袁世凱對滿洲政府的政變，竟換取民國第一任總統的地位。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三年追述這事道：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犧牲性命爲國效力，艱難冒險，努力奮鬥，故能成功。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爲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於革命黨，何啻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總理全集第二集三八六頁）

本來革命行程之中，舊政權已經解紐，則各種社會勢力，都爭鬪於混亂之中。革命的發展與衰落，全看民衆勢力的伸張與萎縮。在歐洲十八九世紀諸革命，中間階級向貴族進攻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訴諸農民無產大衆。農民無產大衆既經蜂起，貴族乃趨於崩潰。中間階級的上層（市民階級）乃組織自己的武力向大衆反攻。而其下層（小市民階級）則援用大衆的力量以取政權。這時候，大衆的前鋒集團活躍於政治舞臺之上，形成革命的最高潮。若小市民政府於取得政權以後，又回頭向大衆反攻，則大衆失敗以後，這依賴大衆以取政權的小市民政權便相隨失敗，而貴族便乘機規復權力了。

86887
在辛亥革命行程之中，中間階級沒有發展農工大衆的威力，所以軍事一起，就感覺與新政派官僚士大夫妥協之必需。新政派官僚士大夫

依中國商人地主的勢力，窺伺革命的弱點而因乘之。這是類似歐洲革命行程之點。但是辛亥革命卻有與歐洲革命不同的地方。這是什麼呢？最大的一點是一九〇〇年以後，新工業的發達雖有見端，但受外國商品廉價輸入的限制，尙不能有顯著的進步。至於商業則除舊商人階級而外，都是買辦的附庸。所以中間階級（民族資本階級）的力量，非常薄弱。因此，辛亥革命一經發動，社會的領域，便只是商人地主與農民無產者兩個壁壘的戰場。辛亥革命中的農民無產者運動，既不能望太平天國的項背，則革命的發動，徒爲商人地主士大夫造機會而已。自太平天國以後，早已實際上掌握大權的漢族士大夫，乃乘中央權力的解紐而實行政變，把從來有權的實際，表現出來。

所以，辛亥革命的行程，可以用三句話來表示：（一）中間階級領導農民無產者發動革命，（二）滿洲貴族與漢族商人地主相與均衡的絕對王權因而解紐，（三）漢族商人地主實行改變，表現其實際久握的權力，構成一個支配農民及中間階級的政府。

六 辛亥革命後軍閥政治的必然性

絕對王權的解紐，一方面固然把漢族商人地主久已掌握的政權表現於形式上面，他方面卻也把各省區督撫分權的潛勢表現到形式上面了。袁世凱的新軍一時雖有征服江南的氣燄，但是，北洋新軍分受地盤以後，仍因襲督撫時代各省區「尾大不掉」的形勢。袁氏既死，北洋

86888

系統也把這種形勢表現起來。

外國資本及商業資本和封建剝削不斷向農民進攻。農民破產所構成的大量過剩人口，沒有相當發達的新工業能够吸收，乃成爲軍隊人口的來源。各省區的軍閥，以此擴大軍隊，因軍隊擴大又企圖擴大地盤；

地盤擴大更需用較多的軍隊。其結果各系軍閥的均衡時時破壞，引起民國初期軍閥的混戰。

這是辛亥革命失敗所留遺的成果。

一九三一、七、二八，上海。

作家之假名

芒

女作家往往喜歡用男性的假名來發表她們的作品，如英國的喬治伊力渥脫 (George Elliot)，法國的喬治桑 (George Sand)，她們的假名，都是男性的名字。同樣男作家也喜用女性的假名來發表他們的作品，如霍浮 (Oliver Madox Hufter) 發表了幾部小說，皆用女性的假名琴妮華德 (Jane Wardle)，都德 (Alphonse Daudet) 也曾有一時期用瑪麗迦士東 (Marie Gaston) 的假名。虎克 (Theodore Hook) 也會用雷姆斯波莎夫人 (Mrs. Ramsbotham) 的假名發表他的初期作品。梅丘 (Horace Mayhew) 常用璇聲開麗克 (Susan Crick) 來隱藏他的真名，在美國很負時譽的露絲柏婷東 (Ruth Parington) 其實就有郝力波 (B. P. Shilliber) 的假名。詩人史橫波 (Savinburne) 當他寫辛辣的罵人的散文發表於雜誌上的時候，常用曼儂夫人 (Mrs. Manners) 的假名。詩人惠鐵兒 (Whittier) 有時也用女人的假名來發表他的詩，詩人兼批評家的夏柏 (William Sharp) 的一生，常用費婀娜美開羅 (Fiona Macleod) 來代替他的真名。

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心理，女人喜歡用男子的名字，男子也喜歡用女人的名字這種錯綜的心理現象是很耐人玩味的。